

《愤怒的葡萄》的流动性研究

严嘉楠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2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10日

摘要

在《愤怒的葡萄》中, 约翰·斯坦贝克呈现了三重流动性维度: 身体流动、资本流动与情感流动。身体流动揭示了迁徙行为如何受到资源与社会现实的限制; 资本流动则对比了金融力量的持续循环与流民劳工的被迫漂泊, 凸显了资本积累与劳动流失之间的不平衡; 而情感的流动则体现在家庭与移民营地的日常经验中, 显示出强制性的迁徙如何催生新的情感联系以及共同体的团结意识。由此, 斯坦贝克呈现了流动的悖论性, 并进一步揭示了大萧条时期美国梦的内在矛盾。

关键词

《愤怒的葡萄》, 路漂, 流动性

Study on Mobilities in *The Grapes of Wrath*

Jianan Y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March 25, 2026; accepted: June 1, 2026; published: June 10, 2026

Abstract

In *The Grapes of Wrath*, three interlocking layers of mobility are explored: physical, capital, and affective. Physical mobility reveals how access to movement is structured by class, resources, and regulatory power. Capital mobility contrasts the relentless circulation of financial capital with the forced displacement of migrant laborers, highlighting the imbalance betwee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labor drain. Affective mobility, within family and migrant camps, exposes how forced movement fosters new forms of emotional bonds and communal solidarity. Accordingly, Steinbeck presents the paradoxical nature of mobility and further exposes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the American Dream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Keywords

The Grapes of Wrath, Hobo, Mobil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路漂”¹(hobo)是美国文化中的一个标志性形象，折射了社会经济困境与时代文化精神的交汇。尽管缺乏确切的词源，“hobo”一词于十九世纪美国工业扩张时期出现²，最初指那些四处流动、通常依靠铁路辗转各地寻找临时或季节性工作的劳工。与“流浪者”(tramps)或“无业游民”(bums)不同，路漂的显著特征在于他们愿意工作，尽管他们的工作方式灵活且自主([1], pp. 65-68)。他们还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亚文化体系，拥有自己的行为准则、视觉符号和伦理规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形象的内涵不断扩展，涵盖了“沙尘暴时期的流民、垮掉派塑造的战后路漂，以及世纪末的贫民区游民”([2], p. 26)，并常常代表着自愿的流动与独立的精神。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一路漂想象未能延续。这时，路漂们的迁移不再是一种反抗行为，而是沦为了应对经济动荡、生态灾难和农业工业化的生存手段，流动本身也被纳入资本逻辑之中。《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 1939)正是捕捉了这一转变，刻画了马克·威曼(Mark Wyman)所谓的“汽油流浪汉”(gasoline tramps)——那些被迫离开家园、驾驶破旧汽车西行的家庭。他们在形式上继承了“路漂”传统，但他们的旅程始终被止赎通知、银行贷款和频繁的汽车故障所左右。从孤独的扒火车者到负债累累、挤在二手哈德逊汽车里的家庭，他们的移动不仅标志着交通方式的改变，更意味着流动本身意义的变化。与此同时，迁徙运动不仅体现了地理上的流动，也涉及资本与情感的流动。因此，本文拟将斯坦贝克笔下的“汽油流浪汉”置于早期路漂传统和流动性研究的视野中加以审视，探究斯坦贝克流浪汉书写的深层内涵与独特性。

2. 物理流动：自由与被困

流动性包含多重维度。在《流动性》(*Mobilities*, 2007)中，约翰·厄里(John Urry)指出了流动性的三层含义：移动或具有移动能力的人或物；在阶级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上下运动，是纵向移动；迁徙和移民等半永久性的地理移动，是横向移动([3], pp. 7-8)。蒂姆·克雷斯韦尔(Tim Cresswell)区分了“移动”(movement)与“流动性”(mobility)，强调“移动是从A点到B点的物理位移，而流动则是将移动视为社会的产物。换言之，移动是抽离于权力语境的流动，而流动则是被赋予了涵义、历史和意识形态的移动”([4], pp. 2-3)。就此而言，流动性不仅关乎旅行行为本身，还关乎移动呈现出的社会、文化和制度意义。其中，身体流动，尤其是借助现代交通工具实现的流动，正是《愤怒的葡萄》叙事的核心。

事实上，流动性历来就是美国自我认知的重要部分。克雷斯韦尔认为“流动性常被描绘为美国生活的核心地理事实，它是将欧洲裔美国人及其欧洲祖先区分开来的特征之一”([5], p. 19)。这种文化取向通过作为自由、自我发现和新开端的“开放之路”(open road)得到生动表达。帕顿(Patton)将公路描述为“一个永恒的、不断给出一个又一个承诺的系统，这同时伴随着一种移动的视角带来的轻松与愉悦的遗忘”([6], p. 13)，而布里格姆(Brigham)同样指出，公路旅行是美国独有的标志性体验，与更宏大的自由理想紧密相连([7], p. 15, 18)。值得注意的是，汽车和高速公路系统进一步将美国边疆精神延伸至二十世纪。

¹学者田俊武在《美国路漂文化与路漂文学的源流》中将“hobo”一词译为“路漂”，本文沿用此译法。

²同上，田俊武指出，“内战后的美国正处在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时期，与此相应的是经济的增长、技术的扩张和大规模的企业涌现。同时，随着西进运动的深入，人口也迅速增长，城市迅速涌现，地理扩张也大规模地进行。这些社会条件是导致路漂作为一种群体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

它们将移居转变为持续的流动，使得边疆理想即使在地理边疆关闭后依然得以延续([6], p. 13)。这些观点揭示了道路如何将物理维度的旅行与个人及国家的深层意义联结在一起。

《愤怒的葡萄》中，斯坦贝克的叙事似乎延续了美国文化中将流动与希望关联的传统，这集中地体现在乔德一家对西部加利福尼亚的持续憧憬中。小说中，乔德一家从传单上得知加州急需劳工，相信那里有果实累累的果园，能够为他们提供稳定的生活保障。例如，妈想要一栋长着橙子树的乡下白房子，罗莎夏和康尼打算在城里学无线电技术，梦想着买自己的汽车，过上体面的日子。在沿途的加油站、临时营地和其他迁徙者的口中，加利福尼亚常常被描绘为一个可以通过劳动获得回报的地方。这一集体想象凝聚了人们关于稳定生活与尊严劳动的普遍渴望，使得“上路”本身获得了目的与正当性。由此，六十六号公路所承载的不只是单纯的地理位移。正如斯坦贝克写道：“六十六号是逃荒的人走的路……人们逃避着这一切，他们从许多岔路、马车车道和高低不平的村道来到六十六号公路上。六十六号公路是主要的干道，是逃荒的路。”([8], p. 116)这条路汇聚了无数家庭的流动，而驱使他们踏上这条路并坚持前行的，正是这样的信念：只要移动，就有可能。

然而，斯坦贝克的叙事并未单纯地将流动视为一种解放性的逃亡，而是揭示了流动性本身隐含的阶层化。同样行驶在六十六号公路上，富裕的旅行者驾驶着宽敞舒适、配备奢侈品和各种便利设施的新车。他们驱车前往加利福尼亚欣赏风景如画的山峦，入住比弗利威尔希尔酒店，观看周围电影明星。而乔德一家以及大多数路漂们只能驾驶破旧的汽车或自制拖车，车上则载满了“农具和笨重的工具、床铺和弹簧垫褥，以及可以变卖的一切搬得动的东西”([8], p. 88)。路漂们的哈德逊汽车以每小时三十五英里的速度行驶，而其他车，“牌照有马萨诸塞的，有田纳西的，有罗得岛的，有纽约州的……都是漂亮的车子，每小时跑六十五英里”([8], p. 154)。此外，贫穷的家庭还不得不面对汽车故障、抛锚甚至彻底停摆。乔德一家和其他移民的旧卡车在六十六号公路上频繁故障，遭遇了例如轮胎磨损、油管漏缝、风扇皮带断裂等状况。威尔逊一家的旅程也因他们那辆1925年的道奇旅行车一直需要更换新零件而一再耽搁，甚至导致赛莉·威尔逊错过治疗疾病的最佳时机。在伍德沃德(Woodward)看来，“流动性既与行动自由相关，也与其截然相反的一面相关”([9], p. 467)。车辆的新旧、速度的快慢，在此不只是物质条件的差异，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流动状态：一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流动，顺畅、高效且充满愉悦，另一种则随时面临着停滞和被囚的威胁。

路漂群体在迁徙过程中所遭遇的阻力，远不只是汽车的机械故障，还有制度的阻碍。他们不仅面临歧视，还频繁遭受警察的恶劣对待。西部居民将移民家庭称为“俄克佬”(Okies)，认为他们是小偷，肮脏、愚蠢。他们充满戒备，用棍棒、瓦斯和枪械驱赶这些外人。乔德一家途经某个小镇时，就曾被拿着铁镐和霰弹枪的当地人围堵盘问，最终只能绕道而行。从历史上看，大萧条时期，部分州利用农业检查站盘问外来移民，并颁布地方条例来管控、乃至阻止移民流动。例如，洛杉矶实施的“流浪汉封锁”(bum blockades)行动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反俄州佬”(anti-Okie)法令，都旨在阻止流动人口进入州境。这些措施折射出本地居民对流动工人的普遍不满，后者所代表的贫困处境、潜在的疾病与动乱风险以及对就业市场的冲击，都引发了与本地社群间的矛盾。

显然，获得交通工具的途径、旅行的速度以及迁徙的成功与否都成为了区分阶层的标识。鲍曼(Bauman)在分析现代性中的“自由”时指出，“个体化存在于自治——根据法律上的权利(de jure)——的建立中，而不管事实上(de facto)的自治是否已经很好地建立([10], pp. 70-71)。他们在名义上可以自主选择人生道路，但在缺乏稳定的社会支持和资源的现实条件下，这只是无法兑现的承诺。即便乔德一家得以踏上迁徙之路，他们也无力掌控路途的走向。流动并未给他们带来机遇，反而将他们引入加利福尼亚人满为患、混乱不堪的劳工营地。随着移民大量涌入和冬天的到来，当地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乔德一家人只能挤在破旧狭小的棚屋。即使在果园里从事一天的繁重劳动，他们得到的报酬也极为微薄，甚至难以维系基

本的饮食开支。雇主拒收带有磕碰的果子、克扣工资的行为，更是使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小说结尾，乔德一家住的小屋被洪水淹没，迫使他们在雨中继续逃亡。正是在这种流动与停滞的张力中，斯坦贝克揭示了所谓自由的幻象。

3. 资本流动：循环与垄断

流动性并非单一同质的概念；相反，它与其他各种形式的移动相交织。克雷斯韦尔认为，一种流动性“可能与其他具有截然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特征的流动性共生相关”([11], p. 332)。不同流动性之间的这种动态互动有助于理解《愤怒的葡萄》中乔德一家迁徙旅程所体现的人的物理流动如何与资本流动、商品流动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相联系。

资本流动在小说中首先呈现为一种驱逐性力量。大萧条期间，农业资本通过机械化生产重组了土地与劳动的关系。拖拉机摧毁了房屋，剥夺了农民的工作机会；银行体系则通过回收土地，将世代耕作的农民驱离故土，导致他们失去赖以生存的根基。在机械化生产模式的挤压下，大批农民被迫成为四处流动的季节工人，到遥远的果园里寻找季节性工作。鲍曼将这种转变概括为劳资关系从稳定的“婚姻”转变为不稳定的“同居”：资本的流动性允许公司随意搬迁、裁员或终止合作，工人不再享有长期雇佣的安全感，反而被困在一个利用其不稳定性处境的体系中([10], pp. 247-257)。乔德一家的困境并非个人悲剧，而是历史现实的一部分。他们被迫向西迁徙的经历反映了鲁杰罗(Ruggiero)所记载的1933年“一两百万人上路”的情景，以及“大萧条初期超过二十万美国年轻人无家可归”([12], p. 72)的现实。这些流动并非由冒险或对自由的渴望驱动，而是由机械化导致家庭流离失所后严酷的生存需求所主导。

资本的运作方式并不止于驱逐，它同时也塑造着被驱逐者的流动方向。乔德一家西行的决定受制于资本的另一种流动形式：那些在各地流通、宣传加利福尼亚工作机会充裕的招工传单。这些传单是流动资本主义的工具，通过操控期望来控制劳动力。乔德一家的迁徙既非自主也非偶然；它被一个能够从某一地区抽离资本、留下满目疮痍，同时又以永远不打算兑现的承诺将廉价劳动力引诱到另一地区的体系所驱动。二手车市场则精准地嵌入了这一需求链条的另一端：传单制造了流动的欲望与必要性，汽车市场则收割了流动的成本。

对乔德一家和无数其他移民来说，汽车不是奢侈品，而是改变生活的唯一希望。他们难以支付买车的费用，但在一个流动性是生存前提的世界里，这又是维持生计所必需的。车贩子正是利用了移民走投无路的处境。他们卖给这些家庭的汽车往往状况堪忧。它们有缺陷、定价过高，且被刻意疏于维护。例如，有些二手车贩在旧汽车的齿轮箱里填入锯末让它勉强转动，他们刻意遮掩修过的轮胎补丁，掩饰火花塞的裂缝。他们宣扬车子性能好，能够支撑几万英里的路程，以此哄骗贫困的移民家庭用骡子或者低价变卖家当来换取这些“值得信赖”的工具。然而，这些车辆在途中频频发生故障，不断消耗着路漂本就微薄的积蓄，使他们陷入更深的债务与生存危机。鲍曼的“流动的现代化”(liquid modernity)概念阐明了这种流动性如何在消费社会中创造自由的幻象。他指出，资本具有重新配置生产、重组市场和操控需求的能力，这确保了那些看似出自个人选择的行为，实际上由经济逻辑塑造。消费者可获得的丰富商品和生活方式并非他们自主能动性的证据，而是资本通过广告、营销和符号化品牌来制造和循环欲望的结果([10], pp. 145-156)。在这个意义上，选择的“自由”不过是资本本身流动的产物。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控制生产和分销的公司通过资本流动，免受了大萧条的影响。最初，福特T型车通过流水线生产使汽车普及大众，革新了人们的流动方式。然而到了三十年代，其方正坚固的设计在银行挤兑、失业、通货膨胀的大萧条背景下，在人们对安全舒适的渴求前显得过时([13], p. 151)。而资本的流动性使企业能够迅速适应这种变化的消费需求，推出例如林肯雪飞尔(Lincoln Zephyr)等新车型。康尼一家和卡车司机对其的渴求反映出了它的受欢迎程度。这也体现在书中餐馆前拥有崭新的双轮胎、

带着铜挂锁、闪闪发亮的俄克拉荷马市运输公司的卡车形象中。然而，对于贫困的劳动者而言，流动性的“选择”是生存的必须，他们选择哈德逊车并非因为它光鲜亮丽，而是因为它随处可见、维修方便。多琳·梅西(Doreen Massey)将这种不对称性概括为“差异性流动”(differential mobility)，这指向某些行为主体以削弱他人地位的方式进行移动的能力([14], pp. 63-64)。资本的流动性与劳工的流离失所和生存困境紧密相连。前者通过制造并利用后者的流动困境获利，后者则在被迫的迁徙中不断丧失经济根基与自主的可能性。乔德一家的旅程表明，资本的流动不仅重塑经济景观，更重塑个体的生活。它将匮乏转化为利润，而那些被债务和生计所累的人，即便穿越数百英里，来到新的地方，依旧难以脱困。

4. 情感流动：家庭性与集体主义

“路漂聚居区”(hoboemia)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兴起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时候经济困境驱使成千上万的人上路。它指的是路漂们聚集在一起寻求庇护、食物和同伴的“丛林”(jungles)或临时营地。这些地方不仅仅是生存空间，也是交流中心，流传的报纸和共享的工作信息逐渐催生出脆弱的团结感。在芝加哥这样的城市，这些营地成为了无家可归者的救赎。例如，芝加哥西麦迪逊街著名的路漂营地，在经济繁荣时期容纳了多达三万名流浪汉，困难时期在此居住的流浪汉人数更是高达七万五千名([15], p. 97)。这些临时社群通过互助生存培养出流动的情感纽带，在这里人际关系基于共同的经历而非血缘([1], pp. 69-70)。斯坦贝克将这一传统移植于公路语境中，小说中六十六号公路沿线的营地延续了类似的共生精神。

沿着六十六号公路，路漂们栖身于干涸的沟渠、路边的空地以及临时的汽车营地，这些空间如同城市流浪汉的营地一样，形成得快，消散得也快：“他们沿着这条大路终日缓缓地行驶着，到了晚上就在水边停歇下来”([8], p. 117)。当乔德一家遇到威尔逊一家时，互助成为了形成共同体的基础。他们围着篝火分享炖猪肉，交换修车的故事，合力修理车辆。这种情感联结在乔德爷爷去世时进一步加深。赛莉把自己的帐篷让给了弥留的老人，并与乔德妈妈一起精心料理其后事。这种模式贯穿了乔德一家的整个旅程。在政府经营的营地，陌生人帮助汤姆找工作；在摘棉花的定居点，乔德妈妈与邻居家庭交换工作信息，甚至音乐也将共享的情感转化为声音。在停宿的地方，六弦琴的低沉嗡鸣、口琴的流利调子以及提琴的高亢尖啸将听众拉近，直到“大家围拢来”，因为他们情不自禁([8], p. 344)。这些场景展示了情感如何在流动的空间中流转，并形成了劳伦·博兰特(Lauren Berlant)所提出的“亲密公众”(intimate publics)。这一概念揭示出，“亲密”(intimate)和“公众”(public)并非处于某种对立关系(尽管常识或直觉往往会这么认为)，而是相互交织的([16], p. 180)。在流动的空间中，陌生人也能够通过共享的个人感受、日常生活经验和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产生联结。

斯坦贝克对情感流动的书写也呈现了流动性与家庭性的辩证。一方面，乔德妈妈的存在构成了家庭情感结构的核心支点。乔德一家的卡车充当了一个移动的“家”，是个人与集体情感交融的空间。路途上，乔德一家人要应对公路行驶带来的身体和情感上的双重考验，但乔德妈妈对家庭纽带的坚守，使得向西的旅程从单纯的流离失所导致的逃亡转变为一种流动的栖居形式。在沙漠中，乔德妈妈独自隐瞒了奶奶的死讯，以确保全家能安全通过沙漠。这一行为将私人哀悼与集体需要联系在一起。她的领导力也防止了家庭的分崩离析。当威尔逊一家患病、旅行车发生故障而导致有分头行动可能时，乔德妈妈拒绝让她的儿子们离开群体，坚持说他们只有家人了。由此，流动性不再是对责任的逃离，而代表着集体的坚守，将个体的家庭与共同体联系起来。

另一方面，正是这种持续的流动，使家庭成员的个人意志与维持集体完整性间的矛盾凸显出来。例如，历经艰险抵达科罗拉多河畔后，乔德一家在此休整，准备穿越沙漠前往加利福尼亚。然而，诺亚在听到路人对加州艰辛生活的描述后，决定不再跟随家人前行，转而选择沿着河走下去。抵达加利福尼亚

之后，康尼看到当地警察与农场主共同欺压百姓后感到绝望，觉得在此挣扎甚至不如回老家找一个一天三块钱的工作。最终，他抛弃怀孕的妻子罗莎夏，不辞而别。乔德妈妈的坚守与诺亚、康尼的出走，作为同一状况下的不同选择，共同构成了斯坦贝克对情感流动之复杂性的呈现。

值得注意的是，流动对情感的塑造，并不止于家庭内部，它同样开启了一种更大尺度上的集体意识。威廉·伍尔福德·普赖尔(William Woolford Prior)注意到，“美国公路的广袤网络似乎引导着人物走向一种超越国籍和人性的精神召唤之中”([17], p. 9)。对一些人来说，起初只是为了谋求生计的旅程，逐渐变成了直面自身困境根源的时机，因为“高度流动的社会的兴起重塑了自我——其日常活动、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与更广阔世界的联系”([18], p. 3)。不断的流动迫使人们与他人接触，直面他人的苦难，并将个体的生存转化为共享的道德视野。

叙述者写道，“西部地区对开始出现的变动紧张起来了”，而“原因不外乎是一个个人肚里的饥饿，扩大了一百万倍；不外乎是一个人心灵的渴望，求快乐、求安全的渴望，扩大了一百万倍”([8], p. 150)。斯坦贝克笔下的人物起初并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们最终通过流动获得了这种领悟，展现出互助团结的精神和对他人的关爱。吉姆·凯西集中地体现了这种转变。起初，凯西对制度化宗教的幻灭使他漂泊无依，游离于社群之外。但当他与乔德一家西行，与那些贫困家庭接触时，他意识到他们的挣扎并非孤立的不幸，而是更宏大的经济秩序的产物。用他的话说，也许“所有的人有一个大灵魂，那是大家所共有的”([8], p. 22)。这种认识最终将他引向集体行动，促使他做出组织罢工进行反抗的决定。汤姆则追随了他的脚步。起初，汤姆只将流动视为家庭生存的手段，然而目睹凯西被残杀后，他继承了凯西的使命，发誓为所有被压迫者而战。这种精神在小说的最后场景达到高潮：罗莎夏在失去自己的孩子后，将自己的乳房送到了垂死的陌生人唇边。在《愤怒的葡萄》中，六十六号公路将乔德一家和成千上万相同命运的人引入同一条道路，汇聚为一个共同体。正是情感的流动，将流离失所转化为归属感，将饥饿转化为团结，将绝望转化为反抗。

5. 结论

《愤怒的葡萄》中，“上路”对乔德一家而言，既是别无选择的生存手段，也是维系家庭情感与建立共同体的可能路径。斯坦贝克正是在这种强制与自主、困境与韧性相互交织的张力中，赋予了路漂书写以超越个人命运的历史纵深。小说所描绘的流动性体验远非均质，它在阶层、资本与情感的介入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而正是在这些差异之中，大萧条时代美国社会的矛盾也得以浮现。斯坦贝克的叙事并未随大萧条的结束而失去其现实意义。当代全球性的难民危机、劳动力迁移以及气候变化引发的被迫移民，均与小说中的核心议题呼应：流动的权利是否平等？迁徙的代价由谁承担？被迫的流动如何重塑家庭与社群？斯坦贝克的文学想象为理解这些当代困境提供了参照。

参考文献

- [1] DePastino, T. (2003) *Citizen Hobo: How a Century of Homelessness Shaped Americ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ttps://doi.org/10.7208/chicago/9780226143804.001.0001>
- [2] Forsberg, J.H. (2016) *Rags, Riches and Rye: Hobohemian Practice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Nevada.
- [3] Urry, J. (2007) *Mobilities*. Polity Press.
- [4] Cresswell, T. (2006) *On the Move: Mobility in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 Taylor & Francis.
- [5] Cresswell, T. (2001) *The Tramp in America*. Reaktion Books Ltd.
- [6] Patton, P. (1986) *Open Road: A Celebration of the American Highway*. Simon & Schuster, Inc.
- [7] Brigham, A. (2013) *Critical Meeting Places: Major Approaches to the American Road Narrative Genre*. In: Primeau, R., Ed., *Critical Insights: American Road Literature*, Salem Press, 15-31.

-
- [8] 约翰·斯坦贝克. 愤怒的葡萄[M]. 胡仲持,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 [9] Woodward, I. (2010) Mobilities. In: Jackson II, R.L., Ed., *Encyclopedia of Identity*, Sage, 464-467.
- [10] 齐格蒙特·鲍曼. 流动的现代性[M]. 欧阳景根,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 [11] Cresswell, T. (2008) The Production of Mobilities. In: Oakes, T.S. and Price, P.L., Eds., *The Cultural Geography Reader*, Routledge, 325-333.
- [12] Ruggiero, A. (2005) *American Voice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Benchmark Books.
- [13] DeLucia, L. (2014) Positioning Steinbeck's Automobiles: Class and Cars in The Grapes of Wrath. *Steinbeck Review*, **11**, 138-154. <https://doi.org/10.5325/steinbeckreview.11.2.0138>
- [14] Massey, D. (1993) Power-Geometry and a Progressive Sense of Place. In: Bird, J., et al., Eds., *Mapping the Futures: Local Cultures, Global Change*, Routledge, 60-70.
- [15] 田俊武. 美国路漂文化传统与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J]. 英语文学研究, 2022(1): 92-108.
- [16] Berlant, L. and Prosser, J. (2011) Life Writing and Intimate Publics: A Conversation with Lauren Berlant. *Biography*, **34**, 180-187. <https://doi.org/10.1353/bio.2011.0008>
- [17] Prior, W.W. (2012) On the Move in the Grapes of Wrath and on the Road: Change, Mobility, and Narrative in Mid-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Ph.D. Thesis, James Madison University.
- [18] Elliott, A. and Urry, J. (2010) *Mobile Lives*. Routledge.